

人民的诗人白居易

继李白、杜甫之后，唐朝另一个伟大的人民诗人是白居易。他吸收了前人的成果，在诗歌创作上达到了新高峰。

白居易(772—846)，下邳(今陕西渭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他生活在一个动荡不安的年代里，唐德宗贞元十六年，进士及第，五年以后当了周至尉，开始登上政治舞台。县尉是封建王朝的下级官员，在这个岗位上，一方面对上级官员要奔走逢迎，另一方面对其属下人民进行压迫和剥削。这样的官场生活，白居易当然是不乐于久居的。但是在那近两年的县尉生活里，他却有了一些意外的收获。白居易由于亲眼看到下层人民生活的疾苦，丰富了他诗歌的创作源泉。从这时起，白居易写出不少名篇。元和 2 年(807)冬天，他被调到长安，又经过一次考试，当了翰林学士。元和三年任左拾遗，他除了写一般的后奏外，更有意识地以诗歌来表达自己的政治主张。在这些诗里，他尖锐地揭露了贵族官僚的巧取豪夺，以及他们的穷奢极侈荒淫无耻的生活。他的诗歌在当时就发生相当的影响，使达官显贵们大为不满。不久，便遭受一连串的排斥和打击。元和 10 年(815)，被贬为江州司马，这件事是白居易的政治生活和文学生活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他虽然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改革政治的主张，但是，他再也没有青年时代那种锐气了。长庆 2 年(822)，出任杭州刺史，这是诗人多年的夙愿，所以他非常高兴。他得到任命以后，急忙整顿行装，十月初便到达目的地。到杭州后，本着“勤恤人庶，下苏凋瘵”的精神，事无巨细，他都亲自动手。当时杭州人民最大的困难就是饮水问题。李泌在杭州时，曾开凿六口井，白居易“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新唐书·白居易传》)白居易又组织力量增设湖堤，加高数尺，以蓄水灌田，从此濒湖 10 万多亩土地解除了旱涝的威胁，使杭州人民的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他在杭州三年，于长庆 4 年转任苏州刺史。在苏州两年多，后又担任刑部侍郎、河南尹。会昌 6 年(846)8 月卒，终年 75 岁。

白居易的晚年生活陷于“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矛盾之

中。这种矛盾是从贬谪于江州开始的，当时他察觉通过皇帝实现“兼济天下”之志是不可能的。良心促使他对人民的苦难又不能熟视无睹，所以只能在个人职权范围内替人民作点好事。诗人在忠州、杭州、苏州任职期间，程度不同地为人民解除了一些痛苦。从苏州‘病免郡事’以后，他发现牛李党争日益激烈，看出政治改革更难了，便决定走‘独善其身’的道路。在当时恶劣的环境里，他不向权贵低头，不为党争所累，保持了人间的正义和自身的高洁，这种精神是高尚的。

元和2年(806)，白居易写出几首名篇，其中有《观刈麦》和《宿紫阁北村》二首。他在《观刈麦》一诗中写道：

“田家少闲月，五月人倍忙。夜来南风起，小麦覆垄黄。妇姑荷箚食，童稚携壶浆，相随饷田去，丁壮在南岗。足蒸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复有贫妇人，抱子在其傍，右手秉遗穗，左臂悬弊筐，听其相顾言，闻者为悲伤。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这首诗反映农民在炎夏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情景。看！一个劳动着的农民，顶着烈日，在拼命地干着。他忘记了疲劳，忘记了炎热，只知道珍惜夏日白天时间长！在他旁边有一个贫妇人，她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提着破筐，艰难地拾地上丢掉的麦穗。因为她家里剩下的麦子，已经拿去交税，现在为了活命，只能靠拾一点麦穗度日。诗的最后一段，诗人把农民的饥饿生活和自己的优裕生活作了对比而感到不安，并谴责自己。正因为这样，所以诗人的思想感情和人民群众的距离缩短了。从而使诗人的创作，逐渐走向新天地。

在元和三年以后的几年里，诗人白居易写了《秦中吟》和《新乐府》，充满了战斗激情，现在列举几篇有代表性的作品介绍一下。

在《卖炭翁》里，生动地反映了一个手工业者的悲惨遭遇，诗人写道：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

炭贱愿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官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唐朝后期的宫市，实际是以给皇帝购买生活必需品为名，公开掠夺长安工商业者的财物。白居易借着这样一个具有代表性的故事，大胆地揭露了这种强盗制度。诗人首先用“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形象地描写了一个卖炭老人的外貌，然后指出“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老人就靠这一车炭维持生活。这可怜的老人“身上衣裳单”，又加上“夜来城外一尺雪”，因此他是不会不希望天气能暖和一些的。但是，他为生活所迫，却“心忧炭贱愿天寒”，希望天再冷一些，希望炭价再高一点。这个反映卖炭翁内心矛盾的细节刻画，更加突出地写出了那时劳动人民的悲苦，深刻揭露那个社会的罪恶本质。叫人愤怒的还不止于此，这车炭却被宦官及其随从白白地抢走了，换来的只是不值多少钱的“半匹红纱一丈绫”，这是多么残酷的暴行呵！

元和4年(809)正月，南方大旱，当时受灾面积很广，波及到浙东、浙西、荆湖、襄鄂等地，灾情惨重，人民饥馑。到了3月，长安一带也发生旱灾，农民生活极端困难。但是地方官仍然催租逼税，逼得农民破产。诗人在《杜陵叟》一诗中写道：

“杜陵叟，杜陵叟，岁种薄田一顷余。三月无雨旱风起，春苗不秀多黄死。九月降霜秋早寒，禾穗未熟皆青乾。长吏明知不申破，急敛暴征求课。典桑卖地纳官租，明年衣食将何如？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不知何人奏皇帝，帝心恻隐知人弊；白麻纸上书德音，京畿尽放今年税。昨日里胥方到门，手持敕牒榜乡村。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这首诗说明农民在旱灾袭击下，缺吃少穿，倾家荡产。皇帝虽然下了免税的诏令，但“十家租税九家毕”，免税的诏令不过一纸空文。这是一方面，诗人又注意另一方面。长安的贵族官僚却是骄奢淫逸，挥霍无度。这些现象使白居易非常愤慨，他以沉痛的笔调

写下具有强烈讽刺意味的诗篇——《骢巴》：

“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借问何如者？人称是内臣。朱绂皆大夫，紫绶或将军。夸赴军中宴，走马去如云。樽罍溢九醖，水陆①罗八珍，果擘洞庭桔，脍切天池鳞。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

诗人在这里无情地揭露了人民和统治集团尖锐的矛盾，白居易的爱憎感情，表示得多么鲜明！从这里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感情和人民群众越来越近了。

白居易的作品，不仅通过个别历史现象揭露封建统治者的荒淫无耻生活，而且还能抓住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戳穿唐朝后期阻碍历史发展的主要症结，进行控诉和批判。他在《重赋》一诗中写道：

“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织绢未成匹，缁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缙帛如山积，丝絮似云屯，号为‘羨余’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唐朝皇帝为了挥霍享乐，除了国库以外，还另设私库，储藏群臣贡奉的财物。节度使秉承皇帝旨意，在正税以外，又巧立名目，给皇帝进贡。因为进贡得到皇帝的欢心而擢升官职的人很多。但是在广大人民方面，由于被榨取这些“羨余”物，则造成“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的结果。而最高统治者并不珍惜这些从人民身上剥夺来的财物，他们挥霍不尽时，放在仓库里烂掉，化为尘土。这里诗人把讽刺的锋芒仅仅指向“贪吏”，他不敢直接指出是皇帝的罪过，并且还美化皇帝，这是白居易的阶级局限，不应当过分苛求。

①水陆：指水陆所产美食。

白居易的诗不仅有很高的思想性，而且有很高的艺术性。他掌握了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描写了无数典型形象。白居易的现实主义创作是自觉的，具有鲜明的目的性，他力求高度地概括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选取最典型的事件人物，运用一系列方法来创造多种典型形象，全面地反映社会本质。

另一方面，诗人善于利用细节刻画，用对比抒情和叙事相结合等一系列艺术手法来塑造典型形象，使之鲜明突出。他无论写一个人物或一件事，都能感动读者，痛苦的令人流泪，愤怒的令人发指。读了白居易的诗，使我们感到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

从白居易的全部作品看来，他的语言通俗易懂，明白流畅，但同时又是经过千锤百炼，作了大量的艺术加工。

正因为白居易诗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所以他的诗歌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白居易的诗在唐朝就被广大群众所喜爱。他对元稹说：“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读者，士庶儒徒嫠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不仅如此，他的诗还被“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白氏长庆集》序）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市民百姓，雅俗共赏，至于乐工歌伎，则更相兢习，所以元稹感慨地说：“自篇章以来，未有流传如是之广者。”（《白氏长庆集》序）特别是他的《长恨歌》和《琵琶行》，更是被很多人传诵。一个诗人的作品能这样密切地和人民的生活联系在一起，是古典文学中所没有的事。

白居易的讽喻诗，对后代的影响最深远，唐后期的张籍、王建、元稹、李绅等，围绕白居易形成一个以新乐府为中心的现实主义诗歌高潮。到了晚唐，皮日休等现实主义诗人，就是受白居易的理论和创作的深刻影响，写出了具有强烈战斗性的诗篇，给诗歌发展开辟了新途径。唐朝新乐府的精神和艺术风格，被历代进步作家广泛地学习摹仿，用以指责当代的政治弊病，反映人民疾苦，并且和单纯追求辞藻格律的形式主义艺术流弊进行尖锐的斗争。宋朝的王禹偁、陆游等人的现实主义作品，都受其影响。王禹偁自己说：“本与乐天为后进”。除了著名作家以外，历代学习白居易的人还有很多。

白居易诗在国外也广泛流传。李商隐说：“姓名过海流入鸡

林、日南有文字国。”日本、新罗诸国也家有传写。日本的嵯峨天皇曾经抄写许多白居易诗，藏之秘府，暗自吟诵。可见当时白居易诗已经获得很高的国际声誉。不少外国读者通过白居易的诗，和中国人民结成了文字因缘，促进了中外友好关系的发展。

韩愈、柳宗元与古文运动

古文是与骈文对立的概念，其特点是散行单句，不拘形式，不像骈文讲究排偶、辞藻、音律和典故，在文体上恢复了先秦两汉的传统，因此叫做古文。

骈俪文是六朝的产物，六朝时期，士族门阀专政，他们生活空虚，写文章只能在骈辞俪句上争妍斗丽。到了北朝末期，颜之推、苏绰等人就反对骈文，主张文体改革。到了唐初，反对骈文者越来越多，其中最著名的是陈子昂。他认为，改变文章的内容，必须配合适当的形式。他根据自己的主张，写了很多散文，对文体改革作出了贡献。陈子昂以后，有些学者写文章以五经为本，文体为之一变，开始了散文(古文)运动。其中著名者有萧颖士、李华、独孤及等人，他们继承了陈子昂的精神，开启了古文运动的先河。

唐代古文运动的领导者主要是韩愈和柳宗元。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南阳人。唐德宗贞元8年(792)进士，曾任刺史、吏部侍郎等官职。安史之乱以后，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经形成，中央政令无法贯彻。同时佛教道教势力猖獗，破坏国家税收，威胁李唐王朝的统治。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统治阶级中有些知识分子看到了这种政治危机，为了维护行将崩溃的王朝，因此打着‘复古’的旗帜，主张恢复孔孟思想正统的统治地位。古文运动的倡导者韩愈是主要代表人物，企图以儒学来取代佛道的宗教。韩愈认为，人们对儒家所谓‘君臣之大义’‘夷夏之大防’发生了动摇，就是破坏了君臣上下尊卑贵贱的封建道德的准则。这种封建等级制度的破坏，就意味着整个封建统治秩序的走向崩溃。韩愈为了挽救这种危局，所以才不遗余力地提倡儒家道统，反对佛老。唐代的古文运动，是伴随着社会政治运动而产生的。因为韩愈等人要宣传自己在政治上的一套主张，宣扬儒家

思想。当时的骈俪文已经成了自由表达思想的桎梏，文章内容要求突破那种旧形式的束缚，因此他们便不得不以借助‘古文’为名，开展一个反对骈俪文的文体改革运动。韩愈在《答李秀才书》中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这个‘道’就是儒家思想，韩愈原来是要从古人之‘辞’以求古人之‘道’。

韩愈一方面主张‘文以载道’；一方面反对骈体文，极力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体，从词汇和语法两方面来建立新型古文的标准。他准备创造一种融化古人词汇语法而又适合于反映现实表达思想的文学语言，同时力求用这种新颖的文学语言，创造一种自由流畅直言散行的新形式，这就是韩愈文体改革的主要内容。

韩愈不仅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而且也是杰出的古文学家。他把新型古文广泛地用于政论、书后、赠序、杂说、碑铭等各种体裁，创造出很多优秀作品。

韩愈的政论有《原道》、《原性》、《原毁》、《争臣论》、《谏迎佛骨表》等，都是散文名篇。这类作品内容虽然宣扬儒家思想，有不少糟粕，但文中坚决反对佛道，反对寺院地主，客观上具有进步意义。唐代佛教、道教恶性发展，僧侣具有免税免役特权，因此买‘度牒’以投靠寺院的人越来越多。社会上大批人奉事佛道，不仅浪费了人力财力，直接影响了工农业生产，而且他们应纳的赋税，全部转嫁给一般人民，当然更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因此韩愈的反佛论文，是打击寺院地主的战斗武器，在当时，有一定进步意义。

在韩愈的散文中，最有价值的是他的杂文。他运用这种文学形式对社会许多不合理现象进行了大胆辛辣的嘲讽，内容犀利，形式活泼，短小精悍，具有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如《杂说》第四写道：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骐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才美不外见，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这里韩愈是用伯乐与千里马比喻贤臣难遇明主，而抒其不平之气。文章具有逼人的气势，通畅的文辞，精炼简洁的语言和形象的比喻，是他的具有高度艺术成就的散文代表作。

在《杂说》里，还有《说龙篇》、《说马篇》、《获麟篇》等，是借助龙、马、麟的遭遇，来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和穷愁落寞的情怀。寓意委曲深致，构思精巧缜密，对后世散文产生了很大影响。

韩愈的某些祭文和序文，如《祭十二郎文》、《送李愿归盘谷序》、《送孟东野序》等，都是优秀的文学作品。里面具有诗一般的语言，形象的描写手法，把抒情、叙事、议论冶于一炉，具有强烈的感人力量。《祭十二郎文》，抒写了对亡侄的沉痛感情，曲折真挚，感人肺腑，被后代人誉为祭文中的千古绝调。《送李愿归盘谷序》，鄙视当时声威显赫的官僚，嘲笑追逐势力的官迷，赞美德行高洁的读书人。文中语调铿锵，情绪激昂，气势充沛。韩愈写道：

“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趋，口将言而囁，处秽污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侥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作者仅用寥寥几笔，写尽了那些利欲熏心的官僚向上爬的可伶可鄙的丑态。

古文运动另一健将是柳宗元(773—819)，他是河东人，贞元9年(793)进士。曾任县尉、监察御史、员外郎、刺史等职。由于参与王叔文的政治革新，被大宦官迫害，贬为永州司马。他在永州生活了十年之久，后调任柳州刺史。这两个地方都是边远地区，荒僻贫困。柳宗元在这样的生活磨炼中，并不妥协屈辱，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保持其优秀品质，怀着郁愤，孤独地死在柳州，仅仅活了47岁。

元和元年，柳宗元离开首都以后，以文章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他竭力主张文章的内容必须‘明道’，所谓‘明道’就是宣扬正确的思想或主张。作品的思想内容必须通过辞藻形式来表达，而辞藻形式又要服务于思想内容。文章如果单纯讲求形式，只追求辞藻的华丽，是不可能具有生命力的。但是，在柳宗元以前，社会上流行着骈体文，他坚决反对这种文体。柳宗元以‘明道’为己任，认为

文学的功能在于‘褒贬’和‘讽喻’，写文章就是为了对美好的事物进行歌颂、宣扬，对丑恶的东西加以批判讽刺，从而赋予他的“明道”主张以具体的内容。这在客观上不仅反对了文学中的形式主义、烦琐主义，而且进一步明确了文学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把文学和社会政治生活紧密联系起来。

在封建社会，《五经》是社会公认的经典著作，是学习的典范。柳宗元认为，要写好文章，必须以《诗》、《书》、《礼》、《春秋》、《易》为本，并参考《孟子》、《荀子》、《老子》、《庄子》、《史记》等书，以吸收融合它们的各种优点。

柳宗元不仅宣扬古代散文，而且写出了大量优秀作品。在他的文集里，保存着很多论文，阐发了他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并通过对社会现象和历史事实的剖析，谴责一切不合理的事物，提出作者自己的见解。如《六逆论》一文，深刻地分析了现实社会的贵贱问题，揭露了‘视其贱者而贱之，贵者而贵之’的世俗观点，反映了阶级矛盾。在《封建论》中，一方面指出分封制的产生在于‘势’，并不是天意或圣人之意，肯定了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另一方面作者解剖了分封制度，批判了‘继世而理’的世袭世禄制度造成‘不肖居上，贤者居下’的畸形状态。柳宗元利用《封建论》借古喻今，斥责豪门地主对政权的垄断，并有力地抨击了藩镇割据。柳宗元这些散文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这是柳文主要成就之一。

古文运动是直接继承先秦两汉优秀散文传统的，柳宗元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最出色地继承和发展了这个传统。他的讽刺散文，把先秦诸子散文仅作设譬之用的寓言片断，发展成完整的更富于文学意味的短篇，使寓言取得一种独立的文学地位。不仅如此，柳宗元还在寓言中带进更为深厚的现实内容，使之能成为具有战斗特色的讽刺文学。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三戒》，文中借驴、麋、鼠三种动物的故事来讽刺那些或位宠而骄或盲目自大的得意忘形之徒，并指出他们自取灭亡的下场。《黔之驴》写道：

“黔之驴。有好事者船载而入。至，则无可利用，放之山下。虎见之，庞然大物也，以为神。蔽林间窥之，稍出近之，慙慙然莫相知。

他日，驴一鸣，虎大骇，远遁，以为且噬己也，甚恐。然往来视

之，觉无异能者。益习其声，又近出前后，终不敢搏。稍近，益狎，荡倚冲冒，驴不胜怒，蹄之。虎因喜，计之曰：‘技止此耳！’因跳踉大_啊，断其喉，尽其肉，乃去。

噫！形之龙也类有德，声之宏也类有能，向不出其技，虎虽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夫！”

这类寓言时常概括了一种普遍的生活真理，其讽刺对象是比较广泛的。但这些徒有其表、虚张声势的“庞然大物”，在统治集团中却是大量存在的。因此，这种寓言无疑是刺向整个官僚集团一把锋利的匕首。

柳宗元另一篇现实主义的作品是《捕蛇者说》，作者在这 500 字的短文中，深刻揭露出赋役之毒甚于毒蛇的真相，具体地描写了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苦，暴露封建剥削的残酷性。蒋家祖孙三代都以捕蛇为业，以毒蛇交税，以致“吾祖死于是，吾父死于是，今吾嗣为十二年，几死者数矣！”但是当柳宗元表示代他请求官府废除这种以蛇交税的办法时，捕蛇者竟“大戚”致于“汪然出涕”，说：“斯役之不幸，未若复吾税不幸之甚也。”作者以层层逼近的手法，明确点出主题，指出封建赋役对于人民比毒蛇更毒更苦，人民宁愿冒生命危险去捕蛇，却不愿当政府的纳税户，说明“苛政猛于虎”。作者在字里行间透露了对劳动人民的真挚同情，并天真地希望“观人风者”能有所醒悟，减轻人民负担，体现了作者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

柳宗元在传记文学方面也有很高成就，他写了不少市民和劳动者的传记，真实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悲惨生活，倾注了作者强烈的爱憎，为人民发出不平的呼声。如《童区寄传》反映边区的人口买卖和劳动者的反抗精神；《种树郭橐驼传》以树为喻，反对奴役和压迫剥削人民；《段太尉逸事状》，反映军阀的残暴横行，以及人民被迫害被杀戮的命运，同时歌颂了不避艰险爱护人民的段太尉的英雄形象。

韩愈柳宗元领导下的古文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散文发展的转折点。形式主义的骈体文，经过唐朝韩柳领导的古文（散文）运动打击以后，开始走上了衰亡的道路，他们把文体从骈俪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把活泼流畅的散文送入艺术之宫，扭转了 300 年的文风。

唐代传奇小说

传奇是唐代文学的一朵鲜花，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尤占重要的地位。

从古以来，人民中间一直流传着瑰丽精采的故事，却很少形之文字。唐代以前的小说，只有一些片段的轶事、志怪，没有什么比较完整的作品。到了唐代，特别是中唐以下，风气陡变，作家辈出。他们或据传说，或取实事，或自创情节，极意刻画，始成为文情并茂的短篇小说。鲁迅说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论断完全正确。

唐代城市经济日益繁荣，社会生活也更显复杂，人们要求多种多样的文学表现形式和文化享受。市井之间，说唱的通俗文艺日益流行，如变文之类（见《长安城》章）。新兴的庶族士大夫，较少受阀阅世家礼法的束缚，又不像宋以后的士大夫套上道学的枷锁，思想比较开朗自由，并不鄙薄小说的写作。一批写传奇的作家，就在这种空气中应运而生。

《游仙窟》的作者张鷟(zhuó)是武则天时的进士。沈既济以卢生在邯郸道上的一梦，揭露官场世态，写了名篇《枕中记》，他本人也做过礼部员外郎等官。大诗人白居易的兄弟白行简，朋友陈鸿，都是传奇作家。有两位宰相，也写过传奇。一位是白居易的朋友元稹，他写的《莺莺传》是《西厢记》故事的起源。另外一个牛僧孺，他写的《玄怪录》一书，质量不高，但他对传奇显然是极感兴趣的。

古文运动的两员主将，同传奇都有关系。韩、柳的部分名篇，至少是颇具传奇气息的。韩愈的《毛颖传》把毛笔人格化，柳宗元的《蝘蝓传》借小虫骂贪官，都是这类作品。

传奇因“作意好奇”得名，好的作品不仅情节曲折，反映的社会生活，内容也很丰富。

李朝威的《柳毅传》描绘了一个生动可喜的人神恋爱的故事。洞庭龙女，牧羊荒野；“蛾脸不舒，中袖无光”，这是封建婚姻制度下受压迫的妇女的写照。赤龙千尺，挟着雷霆雨雹，冲天飞去，杀小龙，救侄女，作者塑造了刚烈的钱塘君的英雄形象！柳毅见义勇

为,万里传书,又不肯居‘杀其婿而纳其妻’之名,表现出正直勇毅的性格。他拒婚,心中却又挚爱龙女,作者曲曲传出他的心理状态,最后让龙女化身卢氏,成为眷属,使读者也为之喜出望外。

唐代社会上,门阀士族还有深厚的势力。作者突破偏见,写了几个可尊敬的妓女。白行简的《李娃传》写李娃与荥阳公子的爱情。公子沦落为乞丐时,李娃闻声相认,抱颈拥归,鼓励他,帮助他,终于使他功成名就。蒋防的《霍小玉传》是悲剧。小玉深爱李益,李益登第做官后,却别娶高门,明知小玉病重,也不肯一去探望。后来李益被黄衫豪士逼到病榻前,使小玉于临终前痛责薄情郎君,死后又给李种种惩罚。作者塑造了一个刚烈而又深情的妇女形象,相形之下,李益显得十分卑下。

陈鸿的《东城老父传》写贾昌因斗鸡受玄宗宠信,揭露了统治阶级的腐朽,这是取当代实事,略加渲染而成的。陈鸿还有《长恨歌传》一篇,为白居易《长恨歌》而作,一韵一散,可以并传。

传奇中有少量的思想内容很成问题,而流传甚广,影响颇深的如元稹的《莺莺传》和杜光庭的《虬髯客传》。《莺莺传》里的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作者说他善于“补过”,表现了十足的封建意识。后来戏曲作家克服了这个严重缺陷,才提高了西厢故事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虬髯客传》写隋末虬髯客、李靖、红拂女三个人物的离合,被人叫做“风尘三侠”。作者用意在宣扬李唐的正统观念。其余写侠士故事的传奇,如《红线传》、《聂隐娘》等篇,写侠女为主效力,已开后世武侠小说的先河,更杂有不少糟粕。

总的说来,唐传奇是丰富多采的,既为后世小说的进一步发展开创了道路,又给后世诗人和戏曲作家提供了大量题材,实在是我国文学史上一笔珍贵的遗产。

“大历十才子”

据说有一位同志在出智力测验试题时,写下了“‘大历十才子’是哪十人”一题后,却又匆匆删掉。这是为什么呢?

大历(公元766—779年),是唐代宗李豫的年号。唐代诗歌发

展，在开元、天宝年间由李白、杜甫的杰出成就而形成了一个高潮，到了贞元、元和年间，元稹、白居易倡导新乐府运动，则形成了又一个高潮。在这两个高潮之间，唐代诗歌经历了一个由背离到转趋现实主义的阶段，那就是大历时期。著名的“十才子”便是这一阶段的重要作家。

一般认为：“十才子”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等以为己有，‘皎然《诗式·齐梁诗》）流连山水，称道隐逸。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较少，多数是唱和应制之作。风调相高，稍趋浮响，以致“开（元）（天）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钱仲文集》）当然，到了大历后期，“诸公改辙，盖知前非”，诗风有所改变，写了一些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因此，历代来研究唐诗的学者，都很重视这一阶段诗风变迁的研讨，从中探寻诗歌创作兴衰的各种原因。遗憾的是，“大历十才子”究竟指哪十人，则众说纷纭，迄无定论。最早记载“十才子”之名的，当是《新唐书·卢纶传》。传云：“纶与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 沔、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新唐书》增加了“十才子”一段史料，填补了《旧唐书》的空白，应该说是有功绩的。但是同时期江邻几说的“十才子”成员同它出入很大，多了郎士元、李益、李嘉祐、皇甫曾，而无夏侯审、崔峒及韩翃。这样，“十才子”其实不止十人了。两种记载，都在北宋初期，离唐代不远，差异竟如此之大，不得不令人生疑。然而，问题的复杂性还不仅如此，在南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中，我们又可看到不同于上述的几种说法：一是比江邻几说的少了吉中孚，一是比江邻几说的多了吉顼、夏侯审。另外，严羽《沧浪诗话》说：“冷朝阳在大历十才子中为最下。”冷朝阳并不见上面诸说提及，岂不又多出一说？

通观上述五种说法，只有卢纶、钱起、司空曙、李端四人一致被列为“十才子”成员，其余“六才子”诸说不一，孰是孰非，实难判定。明人胡应麟在《诗薮》中说：“号称‘大历十才子’，主要是从他们之间‘游从习熟，倡和频仍’的关系来讲的，而李益等人稍晚于卢纶、钱起，把他们列入‘十才子’并‘非实录’，值得怀疑。但是，清人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的记载，不仅有李益，而且把略早于卢纶、钱起的刘长卿也列入“十才子”。这样“十才子”便是卢纶、韩翃、刘长卿、钱起、郎士元、皇甫曾、李嘉祐、李益、李端、司空曙等十人了。

显然，胡应麟那条理由又被否定了。因为管世铭所举十人有的年龄差距很大，如刘长卿比李益大近 40 岁，他们之间哪里谈得上“游从”、“倡和”？

真是旧案未决，新疑又生。这纷杂的异说给今人研究唐诗发展添了不少麻烦。若以《新唐书》为据，那李益、皇甫曾等在当时颇有才名，却被排斥在外了，而苗发、夏侯审的诗名并不甚著，未可与诸子相提并论。如果以江邻几之说为证，那彼时皇甫兄弟齐名，似乎不应有皇甫曾而无皇甫冉，且韩翃同时盛名却又没有提及。若说名望，李益、刘长卿当在所列，但考交游，则又难以牵合。因此，现今流行的文学史，只得毫无理由地选择一说，几句带过。如社科院文研所的《中国文学史》，采用管世铭一说，列出“十才子”；而在论述时，却把刘长卿与韦应物并论。游国恩等的《中国文学史》，则承《新唐书》一说，把李益与“十才子”并提。两书对“十才子”都没加以辨析，所举代表也只是没有争论的卢纶、钱起，而对于其他成员的思想经历和创作情况并无介绍和评述。这难道是学者们的疏忽？抑或是不值一提呢？揆其原因，恐怕是诸说纷杂，无以论断，只好无可奈何地一笔带过，以致留下了由待后人揭晓的谜面：“大历十才子”究竟是哪十人？

杜牧诗中的杏花村

每年二三月间，当那一树树杏花绽蕾欲放或是纷纷盛开之时，一些迁客骚人文士博学者，难免会想到杜牧的《杏花村》一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杜牧诗中的杏花村在何处呢？数百年来，众说纷纭，近数年来，争论尤烈。

一说在山西省汾阳县。近年来报刊杂志上首先提出此说。理由是相传自南北朝以来，汾阳即以产酒著名，汾酒享有“甘泉佳酿”之誉，天下杏花村之多难以胜数，而有这般名酒的杏花村确实独在汾阳。但缪钺编著的《杜牧年谱》（载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第一、二两集）中，关于杜牧的生平事迹、每年行动，历历可考，却没有他到过并州（唐代并州相当今山西阳曲以南、文水以北的汾水中游地

区。开元中改为太原府)和边塞的记载。所以,杜牧‘借问’酒家,牧童‘遥指’的杏花村,就不可能在山西省的汾阳县了。

二说在安徽贵池县城西。理由是杜牧在会昌 4 年(844 年)9 月由黄州刺史迁池州刺史(唐池州治所秋浦县,今安徽贵池),会昌六年九月又迁睦州刺史,在池州整整两年 并且贵池县城西有杏花村,素产名酒,所以清人郎遂写了《贵池县杏花村志》,将杜牧《杏花村》收入 后来《江南通志》亦将该诗收入,并言杜牧诗中的杏花村在贵池。这个理由较山西汾阳县说法充分。但细细体味杜牧《杏花村》诗,疑窦也便接连而来:一是假如杜牧是在赴池州作官的路上,即会昌四年九月作此诗,离清明时节尚远,何以会提及路上的断魂之人呢?二是假如杜牧是在池州为官时所写,从会昌四年九月至第二年的清明时节,近半年之久,这位嗜酒的大诗人,难道不知城西数里的杏花村有好酒卖吗?焉有向牧童“借问”之理呢?三是杜牧在贵池为官,要吃杏花村酒,自有当差的服侍,怎会兀自寻觅酒店 因此,贵池说也有问题。

三说在江苏丰县城东南十五里处。其理由是(一)根据诗意,该诗为杜牧途中所写,由‘路上’‘借问’说明杜牧对周围的情况并不熟悉这一点可知。那么,杜牧在什么时候路过丰县的呢?查杜牧年谱,杜牧一生自外郡迁官赴京共四次 有三次过丰县境 大和九年由扬州节度掌书记迁监察御史,大中二年八月由睦州刺史迁司勋员外郎,大中五年秋由湖州刺史迁考功郎中,皆取道运河,经扬州、宋州(河南商丘)、汴州(河南开封)入京。大中二年杜牧曾作宋州宁陵县记。丰县杏花村即在运河至宋州的道上。远古,丰县曾属宋 并且丰县是刘邦的故乡,所以杜牧过丰县境,写一首《杏花村》的诗,是合乎情理的。(二)宋人苏轼写了一首关于丰县朱陈村嫁娶图的诗,诗中写道:‘我是朱陈旧使君,劝农曾入杏花村。而今风物那堪画,县吏催钱夜打门。’言宋时丰县杏花村胜景破坏,猜拳行令豪饮美酒已被县吏打门代替,其诗暗合杜牧《杏花村》诗。苏轼生活的年代离杜牧仅晚 100 余年,他对杜牧杏花村的地址比他以后的人更清楚,因而较可信。(三)《丰县志》最早修于明代,从最早版本的《丰县志》始,版版皆收杜牧《杏花村》一诗为‘艺文’尔后的《徐州府志》亦屡次收入。而安徽贵池郎遂的《杏花村志》是清人的作品 迟于明版《丰县志》,更迟于宋代苏轼的作品。然而如今丰

县城东南十五里一带并无杏花村。只有一村，今名张杏行，至今家家门前院里尚且植杏三五株，可是该村向不产酒，看来丰县说亦难以让人置信。

四说是泛指。理由是中国杏花村很多，诗人不可能指专一的杏花村。不少人认为此说“非矣”杜牧是一位忧国忧民的大诗人，岂能无病呻吟？假如他不亲眼见到一个杏花村，他的诗兴岂能无感而勃发呢？

看来，杜牧诗中杏花村是确有无疑的，这位才学显赫的杜樊川，写的是哪个杏花村呢？这确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谜，何日能解开呢？

二十四桥何处寻

晚唐著名诗人杜牧，在《寄扬州韩绰判官》诗中写道：“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木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这首诗的问世，使二十四桥成了昔日扬州禁苑繁华、风流盛事的象征；同时二十四桥也成了众说纷纭而迄今尚无定论的一宗疑案。

唐人诗中除杜牧提及二十四桥外，尚有韦庄的《过扬州》，该诗最后两句是：“二十四桥空寂寂，绿杨摧折旧官河。”此外在其他诗文中再也找不到二十四桥的踪迹。五代时，由于战乱，扬州沦为一片废墟，而作为扬州繁华的结晶——二十四桥，也为人们所淡忘。

到了宋代，科学家沈括对二十四桥循名责实——以求，在《补笔谈》中写道：“最西浊河茶园桥，次东大明桥，入西水门有九曲桥，次东正当帅牙南门，有下马桥，又东作坊桥。桥东河转向南，有洗马桥，次南桥，又南阿师桥，周家桥，小市桥，广济桥，新桥，开明桥，顾家桥，通泗桥，太平桥，利国桥。出南水门有万岁桥，青园桥。自驿桥北河流东出，有参佐桥，次东水门东出有山光桥，又自牙门下马桥直南……”上列桥名凑成二十四桥之数，但是下马桥系明显重复，浊河下无“桥”字，亦难定为桥名，而极负盛名的禅智寺桥未列入其中，这不能不算是沈括的疏忽。南宋的王象之在《舆地记胜》中说：“二十四桥，隋置，并以城门坊市为名。后韩令坤省筑州城，分布阡陌，别立桥梁，所谓二十四桥者，或存或亡，不可得而考。”

姜白石在淳熙 3 年(1176 年)冬至日来扬州,写下了千古绝唱《扬州慢》,词中有云:“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知为谁生?”若以姜词的具体语言环境来看,似乎是指一座桥。清顺治 10 年(1653 年)7 月,谈迁游毕蜀冈司徒庙,出问二十四桥,当地人说由此向南一里多路即是。他特地去二十四桥怀古,并作《二十四桥》绝句一首:“斜阳古道接轮蹄,明月扶疏万柳西。桥上行人桥下水,落花尚自怨香泥。”从此诗中可见二十四桥是一座桥。这种观点,在清代吴绮《扬州鼓吹词·序》中也得到附和。序中提到:“出西郭二里许有小桥,朱栏碧甃,题曰‘烟花夜月’,相传为二十四桥旧址。盖本一桥,会集二十四美人于此,故名。”

清代李斗在《扬州画舫录》中写道:“廿四桥即吴家砖桥,一名红药桥,在熙春台后。……桥跨西门街东西两岸,砖墙皮版,围以红栏。直西通新校场,北折入金匱山。桥西吴家瓦屋圩墙上石刻‘烟花夜月’四字,不著书者姓名。”但是李斗在书中未肯定此处即为“古之二十四桥”。清道光 26 年(1846 年),梁章钜访寻二十四桥,在《浪迹丛谈》中记下这样的见闻:“二十四桥只是一桥,即今孟玉生山人毓森所居宅旁。玉生尝导余步行往观,桥榜上有陶文毅公题‘二十四桥’大字,询之左近建隆寺、双树庵僧人,俱未敢以为信。”由此可知,难定此桥即古之二十四桥。所以梁章钜在孟玉生所绘二十四桥画卷上题云:“我居扬州不识路,二十四桥定何处?”

有人认为大名鼎鼎的二十四桥是子虚乌有的东西,实际上从来就不存在。它只是唐代扬州桥梁的总称。沈括只强调算度的精确,把二十四桥逐一落实,而忽略了诗歌毕竟是文艺作品,大可不必这样认真地对号入座。

唐代的扬州是个水乡之城,其桥梁设施,不应由二十四座所局限。北宋时,扬州城区南移至蜀冈南麓的平地上,原在蜀冈上的唐城早成废墟,沈括只看到以宋城区为中心的桥梁,而唐城区及其西北郊一带的桥梁大多已无踪迹。唐人李颀所作《送刘昱》中有一联:“鸬鹚山头宿雨晴,扬州郭里见潮生。”可见城内有漕河横贯其间,与运河相通,江潮且能入郭。而城西北郊有五塘,自西至东为陈公塘、句城塘、小新塘、上下雷塘。此地“车马少于船”;到了夜间是一派“夜桥灯火连星汉”的景象。由此可想象得出唐代的扬州何